

论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制约因素与对策

杨庆文, 李军林

(浙江大学历史系, 浙江杭州, 310028; 株洲工学院传播系, 湖南株洲, 413000)

摘要: 影响当代中国政治稳定的制约因素主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要保持中国的政治稳定, 最根本的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同时建立起一整套政治稳定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 中国; 政治稳定; 制约因素; 机制

中图分类号: D6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6-0684-06

—

美国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 政治稳定是公民政治参与能力与政治制度化程度之间的平衡关系, 因此, 可以从静态的政治制度化和动态的政治参与两个层面来解释政治的稳定性。他强调, 现代性意味着政治稳定, 而现代化却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 因为现代化必然导致“社会的动员和政治参与的扩大日新月异, 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却步履蹒跚。结果, 必然发生政治动荡和骚乱。”^{[1](5)}

当前国内对政治稳定之含义的讨论颇多, 可谓众说纷纭,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八种^[2]。综合各种观点可以看出, 大都认为政治稳定是强化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 以保持复杂、有序、具有凝聚力的政治结构。这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它忽视了政治体系对不断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的适应性。事实上, 政治稳定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范畴,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有两个: “有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 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认为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 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 社会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3](155)}

一般来说, 政治稳定应该内含四个基本指标, 即政制、政权、政策和政局状况。政制稳定是指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的稳定与具体体制和形式的有序变化; 政权稳定是指政权组织体系的合法化和制度化; 政

策稳定是指政权体系治理社会的大政方针与基本政策的权威性和连续性; 政局稳定是指政策运行过程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有序性。显然, 政制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前提, 政权稳定是政治稳定的核心, 政策稳定是政治稳定的保障, 而政局稳定则是政治稳定最直接的表现。

就政治稳定形态的划分来说, 学术界分法甚多。如齐甘科夫把政治稳定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动员性的政治稳定, 这是“由上面”、从统治集团及其代表人首倡的; 另一种是自主性的政治稳定^[4], 这是“由下面”、从市民社会展开的, 等等。但从政治稳定在人类历史中的现实表现看, 较为常见的形态是静态政治稳定和动态政治稳定。静态政治稳定以全能式国家和极端萎缩的社会为前提, 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极大的“安全感”, 养成了对政府很强的依赖感, 并逐渐失去了自治能力, 社会竞争也被限制在最低限度, 人们普遍丧失了奋斗、进取的精神。这种稳定以牺牲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代价, 而且为了减少外界可变因素的影响, 政治系统也是封闭性的, 无需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 同时对社会内部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 既排斥外来的优秀文化, 又反对内部的任何变革和创新。由于社会长期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下存在, 致使人们的生产、生活和思想都只能在狭隘的范围内简单的往复徘徊, 社会也只能在同一性质的政治权力系统的建立和崩溃中交替循环。我国古代的社会政治形态就是典型的静态政治稳定。应当指出的是, 这种静态政治稳定看起来很坚固, 实则非常

脆弱,一旦政治体制的封闭状态被打破,或政治停滞和经济不发展超出了社会的承受限度,那么社会将由稳定变为不稳定甚至动乱。正如一台没有排气阀的锅炉,不管它如何坚固,随着气压的上升,它迟早都会爆炸。而且,压力越大,爆炸的程度就更为猛烈。

动态政治稳定是指社会政治系统在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和协调内部诸因素的关系中,求得自身发展并维持政治秩序的政治稳定。它是政治主体在一系列的政治运行过程中实现的,是发展中的稳定。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动态政治稳定:一是政治体系自身的变革与发展。一方面,政治体系应当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不断地对所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进行自我调整;另一方面,还必须“建立适应一个特定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要求变化的稳定的政治体系”^{[5](237)}。因为历史的发展总是不断的促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文化观念的更新,这就要求对政治体系中不适应新情况的部分进行变革,以保证政治体系与社会环境之间达成一种和谐和平衡。二是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这种机制可以衡量“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它社会团体和方式而生存的程度”^{[1](19)}。这种独立的程度实质上就是政治体系的自主性,它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

动态政治稳定的最大特点是其开放性,正如王沪宁所说:政治稳定“必得有开放性,否则达成的社会有序化很可能还会受到挑战,因为封闭性成为暂时的屏障,强行隔开社会的压力,但压力依然存在,一旦屏障消失,有序化便不复存在。”^[6]

通过以上的理论分析,可以得知,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动态的政治稳定,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要“在社会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在改革、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7]

二

当代中国已进入了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迅速而又尚未达到足够水平,社会的旧体制不断解体而新体制尚未完全形成,导致社会深层矛盾日益暴露,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健康进程。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作者认为,我国政治稳定存在如下几个主要

制约因素。

(一) 经济上的制约因素

1. 分配不公日益突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所谓分配不公,主要是指资源分配不公。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权力这只严重变形的手在进行资源配置,导致腐败现象丛生,权力寻租活动猖獗,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一个社会的原有收入分配结构,迅速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据统计,以国际通用的五等分法为工具,把社会上20%的高收入户和20%的低收入户的人均收入作比较,1995年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为3倍,而在1978年是1.8倍;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在1979年是2.9倍,到1995年上升为6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呈扩大之势,以人口加权平均计,城乡之间的平均贫富差距为5.5倍^{[8](445)}。

2. 土地占有的不平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中国社会最大的群体,没有农民的稳定,就谈不上中国社会的稳定。而土地是农民的立身之本,因此,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状况,就成为中国农村政治稳定的晴雨表。

种种迹象表明,农村中的土地有集中的趋势,而土地的集中是一种更为严重的不平等。实践证明,它与政治不稳定有直接的关系。正如西方政治学家所言:“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假定从事农业的人所享有的社会——经济流动机会少,那么土地所有权的的不平等必然更直接地与暴力联系在一起。此点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里是千真万确的,那里的土地所有权的的不平等与死于暴力的人数之间的相关量大约是0.70。”^{[1](52)}本人认为,这里所说的土地所有权,与我国农村所说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概念,有相通之处。

3. 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历史、地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呈现东部经济发展明显优于西部的局面。据1995年的统计,国家向东部的投资是西部的3.68倍;集体经济投资,东部是西部的9.27倍;个体经济投资,东部是西部的3.74倍;外国向东部的投资是西部的18.9倍。在1995年由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评定的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中,东部地区占91个,西部地区为零。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之比为2.38: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最高的城市与最低的城市之比为4.88:1^{[8](389)}。

(二) 政治上的制约因素

1. 某些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导致了政府威信降低

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严重破坏了政治稳定的群众基础、经济基础、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它造成党政机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官僚主义严重,从而损害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威和形象,恶化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削弱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和战斗力。正如邓小平在总结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时所说:“这次出现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9](300)}

腐败现象不仅腐蚀了共和国的肌体,而且严重侵蚀了我们的党魂、国魂、民魂。它是一枚威力无比的毒气弹,毒化社会空气,导致利己主义和道德虚无主义泛滥,从而极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磨灭和化解了人们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使整个社会道德沦丧,使社会舆论在约束腐败行为时显得软弱无力。如果说腐败对现实的政治稳定的破坏力不可低估的话,那么它导致的精神颓废、道德沦丧对我们中华民族和整个社会的危害则更为严重和深刻得多。所以江泽民说:“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10]

2. 政治参与的不成熟和不完善

由于文化传统和现实文化水平的限制,我国现阶段公民的政治参与仍处于不很成熟、不够完善的状态。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参与和政治冷漠并存;第二,政治参与主体多元化,使得政治参与水平呈多层次的特点;第三,政治参与的意识较强而能力较低;第四,制度化政治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第五,公民政治参与的期望值高而政治效能低。

3. 部分基层政权组织涣散,弱化了政治体系对社会的影响和控制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偏差。这主要表现在处理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时候,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而忽略政权组织建设,导致一些地方基层政权组织的软弱涣散,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能力低下。在很多地区,特别是偏远的农村和山区的基层行政、司法组织体制不顺,人员素质较差,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党支部、居委会、村委会、公安派出所、司法调解所等等,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而置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司法、行政管理权于不顾,把这种权力

扭曲为赤裸裸的商品货币关系,结果造成对所辖区内的干群、邻里、家庭、婚恋等矛盾或熟视无睹,或调节不力,导致矛盾激化。

另外,由于社会控制力疲软和手段运用的不当,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走私贩私、制黄贩黄、拐卖人口、赌博迷信、黑社会组织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些地方死灰复燃,大案要案也时有发生,社会治安形势十分严峻,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同感越来越少。同时,基层组织的管理不力,还会造成政令不畅,使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完全兑现,甚至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使许多本应该解决并且能够解决的矛盾长期积压,造成政治不稳定的重大隐患。

(三) 文化上的制约因素

这里所说的文化,主要指政治文化,即“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1](24)}。(政治文化对政治体系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也是双重的,它既能维持现行的政治体系,又可以变革政治体系。正如俄国著名的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所说,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制度是为这个民族的道德风尚所约束的,例如罗马人的旧的共和道德风习消失时,共和国就被帝国取而代之^{[12](10)}。)

1. 从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来看,外来政治文化的冲击制约着社会的政治认同

中西两种文化分属于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存在着民族性的差异。而且,中西社会制度的根本差异又决定了两种政治文化的阶级属性上的本质区别。所以它们在交流的过程中肯定存在着广泛的冲突。非但如此,西方国家还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人为制造意识形态的渗透和瓦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大肆歪曲和恶毒攻击,极力传播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念,并在中国培植反华势力,促使以批判现实社会制度为目标的反主流文化的扩张,这就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情感。

2. 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来看,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制约着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和政治行为的规范化

中国传统文化有两个严重的缺陷,其中之一就是缺乏民主传统。梁启超对此有深刻论述:中国有族民而无市民,有乡自治而无市自治;西洋人之市自治为其政治能力之滥觞,而中国人之乡自治为其政

治能力之炆灶^{[13](291)}。加上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在民众心理积淀的“全能政治”“官本位”“权威崇拜”“清官思想”等等政治意识和政治观念,这些与现代的民主政治思想显然是格格不入的。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发展,新旧政治文化的冲突就必然加剧,从而危及政治稳定。

3. 从主流政治文化本身的变革来看,“左”、右两方面的干扰也会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

在理论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先后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但在实践中,它经常面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并往往由反右而导致极“左”,由反“左”而走向极右。“左”的观念和模式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方式,影响着人们思想解放的力度,阻碍新观念的产生和传播,制约着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

实现政治稳定最根本的途径是发展经济,因为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正如马克思所说:“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4](79)}本文仅拟通过对政治稳定制约因素的分析,从政治体系和政治运行的本身入手,提出一些应对之策。笔者认为,如下六大机制的完善,是政治稳定的关键。

(一) 政治权威的整合机制

“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1](7)}这段话说明了政治权威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主导力量和强有力的工具,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权威可以不加限制地扩张甚至滥用。因此,在加强权威的同时,还必须对权威本身进行调整与完善。

首先,各国经验表明,政治权威整合机制的建立,必须有一个“制度轴心”——核心领导力量为主导。核心力量一般由政党组织来充任,“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1](377)}。而不同的国家,政党组织的数量是有所

区别的。在多党制的国家里,“制度轴心”由不同的党派轮流担当。但“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1](390)}这就在理论上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的“制度轴心”的合理性。同时,新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也表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对政治物质资源、人才资源、文化资源等等的权威性配置,政治稳定的态势是很难维持的。

其次,政治权威整合机制的建立,要特别注意开发权威的合法性资源。一般说来,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资源包括三个层次:意识形态、制度规范、现实政绩。当前,主流意识形态为权威合法性的树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但还需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机构的建设,以增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深化自己内涵、自觉吸纳其它性质意识形态的科学成分、抵制反动落后意识形态侵蚀的能力。就制度规范而言,必须坚持以法治国的方针,切实加强党和政府各种制度、法规建设,积极推行以法治党、依法行政,梳理权力关系,强化权力制约,规范政府行为。就现实政绩而言,既要注重经济的发展,又要集中力量抓一批大案要案,特别要依法严惩腐败现象,消除这一政治之毒瘤对中央权威的恶性瓦解。

(二) 政治参与与表达机制

在当代中国,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理性化、有序化与表达渠道的通畅、完善,是中央政府吸纳和疏导社会力量,确保安定团结的必然要求。针对现阶段我国公民政治参与不成熟的表现,建立和完善政治参与与表达机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 要形成多元的利益表达渠道。我国目前已形成和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各群体之间存在异质性的利益差别,因此,强烈要求表达各自的利益需求。那么政府就要创造条件,以利他们的利益表达。要通过制定法律和政策,对利益表达进行法律保护,不仅使之具有合法性,同时要建立多渠道表达,尤其要多元的顺畅的非强制性的利益表达渠道,如代理表达等。

(2) 要加强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用宪法和法律来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并约束其非理性行为。如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公民进行利益表达的途径和

参政的方式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使用不当,就可能对政治稳定造成破坏。因此需要国家制定更为详细、具体的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使他们在行使政治权利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三) 合理分配机制

分配是否公正、顺达,对于人心的稳定,特别是对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中国政治稳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对于政府来讲,如何将相对稀缺的物质、生活资料按一定的规则公平的分配到不同的社会阶层、群体及个人中去,便是一项极为重要而又关键的任务。对此,政府应当通过建立利益分配特别是收入分配与调节机制,来不断地影响社会不同分配对象的收入状况,达到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缩小贫富差距,稳定社会的目的。

(四) 社会预警机制

社会预警是对可能酿成社会问题,妨碍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社会偏离现象和失序状态的预警,它有助于政府及时、有效地防范和控制政治不稳定。要发挥社会预警作用必须拥有完善的社会预警系统。社会预警系统是各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有机组合体,它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信息报告系统。如村委会、居委会、专兼职社会调查员、抽样调查队、党政工青妇基层组织、公检法司基层组织、信访咨询部门、治安联防组织等,他们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可以发挥社会运行信号的报告作用;第二层次是信息分析系统,由有关研究人员和政策研究机构组成;第三层次是预警处置系统,一般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组成。

(五) 社会缓冲机制

社会中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往往会冲破政治体系的控制,对政治稳定造成冲击,特别是在利益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时候,这种情况更易发生。缓冲机制就是要分解和吸收这种不稳定因素对社会形成的冲击力,减少它们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

发挥缓冲作用的传统单位是家庭。人们都生活在一定形式的家庭中,他们的一些反常思想和行为往往首先在家庭中暴露,家庭就会用其特有的血缘关系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将其吸收和消化。但仅有家庭的缓冲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大量的社会中间组织,它们与家庭共同组成一个缓冲网,来维护社会的政

治稳定。社会中间组织是指在传统社会中独立于行政组织与家庭之外又在国家与公民个人之间建立的、发挥一定社会自治与服务功能的非行政性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学会、研究会、基金会、俱乐部、慈善机构、社区服务机构等等,它们的成立,不仅能满足人民群众依法自由结社、扩大社会交往、实现经济利益、接受社会服务等多种需要,而且能协调社会人员之间的各种冲突,有助于社会人员发泄不满情绪、调节心理平衡等。

(六) 政治文化凝聚机制

政治文化的凝聚机制是指政治文化发挥政治整合作用的一种机制。政治文化可以在人们的观念上使统治阶级的利益以社会共同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从而熨平不同阶级阶层人们的利益冲突和差别感,使具有不同利益的人们凝聚在一起,自觉化解社会张力,对整个政治系统起到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

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凝聚机制就是要通过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提高国民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正确认识社会新生事物与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这种机制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政治信念问题,政治信念是参与政治活动的个人和团体所具有的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固定看法和坚定的主张,它有助于社会共识的形成和政治凝聚力的加强,有助于实现政治主体对政治系统的高度政治认同,是政治稳定的坚实基础,也是保持政治系统良性运行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 [1]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
- [2] 吴志成.关于政治稳定理论的几个问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102-108.
- [3] [美]格林斯坦,波尔期.政府学手册精选(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4] [俄]齐甘科夫.稳定的政治制度的社会阶级基础[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4,(6):18.
- [5]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6] 王沪宁.中国:社会质量与新政治秩序[J].社会科学,1989,(6):19-23.
- [7] 本报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N].人民日报,1997-09-12(1).
- [8] 许明.关键时刻——当代中国亟待解决的27个问题[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 [9]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店, 1973.
- [10] 本报讯. 江泽民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 1993-9-15(1).
- [11] 自潘一禾. 观念与体制: 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 [12] [俄] 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M]. 上海: 三联书店, 1973.
- [13] 张岱年, 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 [14]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Discussion of conditioning factors and countermeasure to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YANG Qing-wen¹, LI Jun-lin²

(Department of History,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 Zhuzhou Engineering college, Zhuzhou 413000, China)

Abstract: Three factors in economy, politics and culture condition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a, of which the economic factor is the base. Therefore, in order to keep political stability in China, it is essential to develop the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to maintain a sustained, rapid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 the factors in politics and economy must be also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t the conditions of present, it is one of most appropriate strategies to find out an integrated series of ensuring mechanism to keep the politics stable.

Key words: China; political stability; conditioning factor; mechanism

[编辑: 颜关明]